

筆談：同文異音下的東亞文化交流

藍日昌*

摘要

近代所謂漢字文化圈者，意謂在東亞區域之內諸國受中國文化之影響，舉凡儒學、佛教及技術等，皆由中國而向外傳至日、韓、琉及越南等，東亞諸國的文化交流的媒介自然是以漢字為主。

東亞交流雖自六朝開始，但當時並無官方語音的觀念，因此交流之時自以當時主流發音為主，而主流發音則隨政治、經濟形勢而變。六朝時以南方吳音為主流，唐時以河洛及西北方音為主流，南宋時則以蘇杭音為主流。

書寫文字雖同，但音調則有差異，這對其他諸國而言，也是有所困擾，音調雖有變化，但書寫則不變，筆談即是東亞交流中溝通的媒介。

明太祖所建立起朝貢制度，政治及經濟來往熱絡，朝鮮作為明朝與日本的紐帶，明、朝之間的燕行使與朝、日之間的通信使，交往之時大體透過筆談溝通。甚至越南與琉球、日本交往之時亦復透過筆談溝通。

筆談之事，少見於唐宋，入明則筆談的記錄頻率轉增，然則筆談出現的頻率則證諸東亞交流的狀況及文化交流的盛景，其事雖簡，其義則甚重大。

關鍵詞：筆談、漢字文化圈、東亞文化交流、朝貢體制、燕行錄

*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教授。

一、東亞的書同文現象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到中國傳教時，觀察到中國語言對東亞各國在交流溝通方面有重大的影響，他觀察到日本人、朝鮮人、交趾人（今越南）及琉球人都各有自己的方言及鄉音，彼此之間很難聽懂對方，但諸國在交流時卻以漢字成為共同的書寫與溝通的媒介。不僅如此，即便是中國境內也是方言鄉音各異，但也透過同文書寫的方式使得溝通成為可能。¹中國境內的方言鄉音各異，擴而大之，東亞各國之內的語言也可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方言鄉音，這即書同文的功能所在，當年秦始皇所制定的書同文制度，影響了往後二千多年的東亞文化交流。以中國文化為共同的學習對象，藉用書同文將東亞各國紐結在一起，而書同文的作用施之於國家之間的溝通則稱之為「筆談」。

至於詳細的使用方法則可以《琉館筆談》一書為例：《琉館筆談》記錄薩摩藩石塚崔高(1766-1817)與琉球人楊文鳳的交友筆談，²書中透過楊文鳳的描述可以了解當時東亞各國在漢字文化圈下的筆談方法。楊文鳳的公使船舶本來要到清朝，卻遇狂風漂流至台灣，彼時琉球與清朝的關係正好，所以台灣的官官員對楊文鳳頗為禮遇，楊文鳳雖然不會講清朝的官話，但透過筆談與台灣官員應答，也參與台灣文人的詩會，與台灣的文人進行詩文唱和，楊文鳳在漢詩文的表現令台灣文人甚為讚嘆。當楊文鳳被送至福州時，同樣的情境再次重現，在福建福州一地也有琉球館，與中國官員進行詩文的溝通也以筆談為主。

從這模式來看，中國官員或文人與境外人士交流時喜歡以詩文唱和，漢詩文是當時東亞文人必需學習的功課，以筆談來唱和詩文，可以展現雙方在漢詩文方面的素養，也可溝通友誼，實為東亞諸國最佳的溝通模式。《琉館筆談》僅有 30 頁，但卻生動地描述了透過筆談交流的實景，同時在此書中對於台灣的地名如新莊、竹塹、澎湖、林爽文之變、生番及熟番等皆有所描述，同時對於台灣的文人與外域人士詩文交流時採用筆談的方式，這也是首見。

《琉館筆談》記錄了琉球學漢文的方法云：

讀法依日本，用鈎挑迴環顛倒讀之，實字先讀，遂字後讀。但久米村無有學校，多歷年所，子弟皆學中國言語，讀書亦用華音，然日本讀法亦不廢也。國王命

¹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0，其原文則見 Ricci, Matteo.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pp.28。

² 石塚崔高為薩摩藩學者，曾編製《圓球萬國地海全圖》，開日本地理製圖之先。

令及民家通用書東，著式與日本不異，惟通中國書東表文一依中國書法。³

所謂的「讀法依日本，用鉤挑迴環顛倒讀之，實字先讀，遂字後讀。」其意即是教材文本是漢文，但讀法則依日本人的讀法，主詞、名詞、介詞及關係詞在前，而動詞則在後，因此需要鉤挑迴環顛倒讀之，訓練下來的結果則是琉球人的口語與日本相接近，而書寫語言則以中文為主。在言文分離的情形下，書寫是可靠的溝通媒介，這即是「筆談」，《琉館筆談》所述筆談的模式實為當時東亞通行之法。

因之，在這種情形之下，明顯的是文字的閱讀與書寫比起讀音的正確判斷更為重要。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中國時，也觀察到中國語文的特性，因此在《華英字典》導論中建議歐洲人士學習漢文的要點云：

我建議歐洲學習者在學漢語時特別注意漢字，這是掌握該語言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記住漢字的筆畫，語音語調是其次的，雖然語音語調有區別，但是對書寫體的漢語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在口語中也沒必要把他分得非常清楚，甚至中國文人也并不熟知漢音語調，它們只是在寫詩時不可缺。注意漢字的結構和適當的詞彙積累尤為重要。聲調有時會影響語義，這種場合中國人會標上注解。歐洲人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語音語調上，熱中於在字母拼音上附上合適的聲調記號。漢語學習者應該認識到所有的這些拼音和記號并不能十全十美地幫助他們學習漢字和發音，除了一些公共場合的對話以外，漢語中任何事情用羅馬拼音來表示是不明智的，**要理解漢語必需通過眼睛和大腦去認識漢字。**⁴

東亞各國也學習了不同時代的中國語，鑒於不同朝代的官方語言不同，而不同方言的音調也有所不同，因此，採用筆談來溝通是最可行之事，因此，學習大量漢字及詞彙要比語音正確更重要，此即馬禮遜觀察所得。

然而「筆談」一詞實有數種用法，最早的用法即雜記之意，如〔宋〕沈括《夢溪筆談》即是雜記類之書，此書傳於韓日，此後，東亞文人也使用筆談一詞來記錄閒散雜記的記錄。例如〔清〕阮元（1764-1849）《定香亭筆談》、〔宋〕陳師道（1053-1101）《禪寄筆談》、〔清〕俞樾（1821-1907）《湖樓筆談》等，這一用法通行於東亞各國。

第二種用法則類似辭典參考文書之意，記錄兩種文字之間的語意的對翻，以備為溝通

³ 《琉館筆談》，頁 29。關於此書作者不詳，約出版於 1808 年，目前收藏於筑波大學。琉球在學習漢詩文的訓讀問題，另見中村春作〈琉球における漢文読み-思想史的読解の試み〉，頁 47-81。收於中村春作（編）：《統「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

⁴ 譯文引用自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頁 26。

之時的參考之用。在這種情形之下的筆談，最明顯者為近代之時，日本為侵略中韓，編製筆談參考書，以備日人在與中國交談時作為參考之用。

例如鈴木道宇《軍用日清會話：筆談自在》一書羅列中日同義的相對語詞，⁵以提供日本軍人在中國時與交談之用，這種用法的參考書籍，即便不是以筆談立名，其意相同。

第三種用法則是東亞諸國來往之時，語言不通之下，藉用共通的漢詩文教養，筆寫漢字以通彼此意念。初始是由於中國儒學文化向外擴展，後來隨著佛教在東亞的傳播推廣，在學習漢文化及與中國貿易往來的需求下，學習漢詩文對東亞諸國的貴族而言益發重要。

自六朝以下，中國成為東亞諸國文化學習、制度模仿及貿易交流的對象，學習漢文成為共同的需求，這就逐漸形成另一種「書同文」的現象，漢字文化圈的概念也成為一股趨勢，⁶目前對於筆談的研究即以第三種為主。

二、中華意識-共有一個天下的觀念

筆談溝通的方式盛行於明清之時，目前對於筆談的研究集中在明清之時的中、韓、日、琉、越之間的貿易及文化交流，東亞各國以漢文化為學習對象，以漢文書寫來表達彼此的意見是比較方便。

但東亞各國之間的交流早於六朝之時，以中國為中心，西域、印度及韓日皆會集於中國。雖然這時代南北分治而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紛立，北方的遊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權與南方由漢民族所建立的政權雖是對立，但實為民族融合的時代，諸民族的交流實需要一種共通的語文。

以中華為中心，同時與西域及印度交流，另一方面將佛教、儒教經學傳與韓國與日本。中土與西域人士的來往，往往是各操己語，能互通雙方語言者以少數的佛教人士為主。但中土與韓國及日本的交流，則是韓日學習漢文典籍必需學習漢語。同一時代的不同區域文化而有不同的表現，此中當有其意義存在。

政治上的對立與文化的交流同時進行著，自韓國到越南，皆共享一個以中國文化為道統所在的天下意念，即便是日本也因受到韓國文化的影響而與中國連結在一起，中華意識的觀念也在此發生。⁷各民族皆有各自的語言，但在溝通之時總要選擇一種最通行的語言，

⁵ 1895年由京都山中勘次郎出版，目前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

⁶ 西嶋定生：〈漢字の傳來とその変容〉，《倭国の出現-東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頁169-180。西嶋定生定義了漢字文化圈這一詞的範圍，以環遼中國的鄰國共享文字、律令、儒教及佛教等，漢字文化圈的用法逐漸被學界所採用，參考李成市：〈世界としての東アジア文化圏〉，《東アジア文化圏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00），頁5。

⁷ 在歷史的發展中，朝鮮、及琉球皆有小中華的稱呼，或被稱為東方君子國等。而關於日本部分，《後漢

漢文學以文化的包融力成為當時共通的選擇。⁸

但西域及印度並不在這中華意識之內，因此在語文的溝通未採用華文，這造成了溝通上的困境。例如《世說新語》中有數則敘述胡道人與東晉名士清談時，借助於身體姿勢以為溝通，彼時尚以無言為佳。另《高僧傳》中則記錄六朝之時的胡僧大都都不通華語，⁹因此只能攜進梵文原本協助翻譯，但卻無力擔當講解之職，語言不通的窘境隨處可見。

而由中國傳播到韓日的學術文化卻不見此困擾，此則以中國為中心向外傳播儒學及佛教，漢語成為東亞共通的強勢語言，但南北方言不一，語言學習的對象要指向北方胡人政權呢？亦或江南政權的語言？¹⁰北魏入主北方，曾打算新造一套國家文字系統，以與漢文字區隔，〔北齊〕魏收（507-572）《魏書·帝紀第二太祖紀》云：

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¹¹

又《魏書·帝紀第四世祖紀上》云：

初造新字千餘，詔曰……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¹²

這說明了北魏曾打算造新字的企圖，這可能是最早胡族造新字的記錄。¹³

書》卷 85〈東夷列傳〉即有倭國來貢之事，《宋書》卷 97〈倭國傳〉則有稱臣來貢的記錄，近代在日本崎玉縣古墳中所發現的劍銘出現「天下」的語詞，其內部銘文則是「其兒名加差披余，其兒名乎獲居世々為杖刀人首奉事來至今 獲加多支齒大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練利刀 記吾奉事根原也」這是借中國天下的觀念來指稱日本的國土，是一種小天下的觀念，透國「天下」的觀念連接整個東亞的政治秩序。奈良即模擬長安而，而京都則自比為洛陽，這都是一種融入東亞秩序之內的表现。在明朝滅亡之後，德川政府初期也以繼承中華正統算居，這都是漢字文化圈所及的中華意識。

⁸ 東亞域內的多語言社會族群，其共通者即是漢字及漢文化，因此以漢字來作為互相溝通的媒介自是不可避免之事。參考村田雄二郎〈漢字圈的語言〉，頁 9。見村田雄二郎（編）《漢字圈的近代-ことば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岩月純一：〈漢字と漢字系文字〉，頁 217-232。收於大西克也（編）：《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9）

⁹ 〔劉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00。〈言語第二〉云：「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又〔梁〕慧皎（497-554）《高僧傳》卷 3〈求那跋陀羅〉傳云「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懷愧歎。」《高僧傳》T50, No. 2059, p334a。

¹⁰ 北魏鮮卑曾下令譯漢籍為鮮卑語，並定名為「國語」，鮮卑曾新造一千多的文字，應也是模仿漢字的結構。同時這種「國語」是鮮卑族群通行之語，並未曾下令全國需學習鮮卑語，因此鮮卑「國語」並不是官方語言，但官方語言的概念恐怕自此開始。〔唐〕魏徵（580-643）《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32〈經籍志〉云「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頁 947。又同卷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頁 935。另同卷在敘述字書部分，載有「國語十五卷、國語十卷、鮮卑語五卷、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真歌十卷、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十八傳一卷、國語御歌十一卷、鮮卑語十卷、國語號令四卷、國語雜文十五卷、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雜號令一卷。」頁 945。這裡的「國語」顯然是秦漢史書的「國語」，而以鮮卑語為國語之意，雖然以鮮卑語記錄的書籍今已不存，但穴窺可欲以一族語言為國家語言的企圖心。參考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東京：汲古書院，2015）第一篇第三章〈鮮卑の文字について-漢唐間における中華意識の叢生と関連して〉，頁 63-76。

¹¹ 〔北齊〕魏收（編）：《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39。

¹² 同前註，頁 70。

¹³ 但〔明〕顧炎武（1613-1682）《金石文字記》卷二〈後魏孝文皇帝吊般比干墓文〉則對北魏造字之說

南北朝之時雖然在政治上南北對立，但對當時的韓日而言，文化的正統性在於南朝，而非地理上更近的北朝政權。佛教及儒家經典從南朝傳往韓日，韓日學者所欲學習的對象在於南朝。因此中原音混合著南方蘇州方言的語音系統成為當時的強勢語言。

唐朝之時，中國成為東亞文化學習的主流，僧侶學者皆到長安學習，帶回大量的三教經典，當然此時以儒家及佛教經典為主，北方的長安的語音系統成為強勢語言，成為學習的對象。¹⁴

北宋在唐末五代之後，其語音系統已混合了西北方言。這種混合西北方言的中原音成為學習的對象。南宋定都杭州，高麗與日本遶道北方的金國，再度與南宋來往，混合了蘇杭的南方言語又成為當時的強勢語言。日語系統中的唐音語系保留著這層關係。

自元朝始，北平的方言系統成為強勢語言，朝鮮的文人及官員可以直接到瀋陽及北平進行朝天或燕行之旅。日本卻因敵對的關係，卻只能到南方寧波一帶進行貿易，因此韓日各自學習的強勢語言分屬不同的語言系統。

在不同時期的強勢語言不同，各自所學習的語言系統也有所不同，更何況各民族以各自的語言訓讀中國語音，可說是但有強勢語言但卻無標準音，然而雖無標準音，但文字書寫系統並無多大變化。因此，通過漢詩文訓練，語言雖然不一定能會通，但只要透過文字書寫，卻是可以達到溝通無礙。¹⁵

東亞諸國對於漢詩文的學習方法約有二種，一為借漢字以造字符，二為使用漢字而改變讀誦的語序。¹⁶

在中國所建立的朝代中，北魏、遼、金、西夏諸國等皆曾借用漢字創造各自的文字系

存疑云：「考魏書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為楷式，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衆文經之不及收者也。則知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是別撰之字自漢而有矣。」頁 258。顧炎武認為造異字（或稱新字）本已有之，北魏不過將這些已造的異字統一罷了，見顧炎武：《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5 冊。

¹⁴ 石井公成（編）：《漢字文化圈への広がり》（東京：佼成出版社，2010）即是從佛教推廣到朝鮮半島及越南等面向，來討論漢字文化圈的現象。

¹⁵ 語音學習的複雜度可以日語中仍保留著中國的吳音、漢音及唐音而言，吳音、漢音之內，還有更為新來的中國語音即唐音，據湯澤質的研究認為遣唐使停止於寬平六年（894），而唐音遲至 9 世紀前傳來，在漢音與唐音之間有一百年的時間差距。關於漢音：一、遣唐使的派遣是在九世紀時盛行，二、天台宗及真言宗的開祖最澄及空海的歸國之時，三、養老四年所成的日本書紀的萬葉是以漢音為基礎，四、朝廷獎勵漢音政策從八世紀時開始。在此之前則是以吳音為主。唐音的大量使用是在鎌倉時期的禪宗及泉涌時，這是以宗派開祖大概在 1200 年左右，如此一來，漢音與唐音之間約有四百左右的差距。中世唐音的場合以江南浙江的方音為主體，二、近世唐音的場合則以杭州音及南音官話為主，加上其他南方各地的方音及北方音。這些不同時期傳入的中國南北方音仍保留在日本語音系統之內。參考湯澤質：《唐音の研究》（東京：勉誠出版社，1987），頁 3-25。

¹⁶ 宮本徹：《アジアの語言と漢字-漢字の受容によるアジア諸言語の変容》，頁 67-271。收於大西克也（編）：《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9）

統，雖然如今只有西夏文字仍留下少數不易判讀的殘卷，但整個說起來仍在漢字文化圈的影響之內。¹⁷越南自宋朝之後脫離中國，但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仍與中國保留著密切的關係，其後也用漢字創造了喃字，採用越南的讀音來讀誦喃字。日本假名字形由吉備真備（693-775）及空海（774-835）所創造，也是採用漢字偏旁。

另一種方式則雖採用漢字書寫，但以點讀的方式改變讀誦的次序，¹⁸使其合於本國的讀法，這種方式有日文的和漢混用或校點法，¹⁹另外則是韓國的吏讀及點吐法。

韓國在諺文出現之前，韓國歷代的文人努力學習漢文，其精通者的漢文使用能力往往不在漢人之下，但對國內的官吏而言，並無需到如此精熟的地步，但漢文的使用仍是官方通用，因此發展出吏讀的標音方式。因此而言，韓國發展出二套對應模式，一者文人盡力學習漢文學，包括儒學經典、詩文創作等皆盡量模倣學習，二者為另一批政府人員創造以韓語的訓讀模式，文字依然是漢字，但改變其語序則依照韓語的頌讀方式讀之，稱之為吏讀。²⁰以今天所留下大量的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來看，不論是儒家經典的詰訓或是詩文的創作，其質與量在這方面的成就頗高，其程度實不下於漢人學者，而古代韓國也以東方君子國而自傲。

不少韓國學者曾也在中國為官，其操持漢文之流利可想而知，最著名的是高麗時代的崔致遠（857-951）於唐朝為官，其《桂苑筆耕集》全然是流暢的漢文。²¹〔高麗〕元曉（617-686）在玄奘（602-664）門下學習唯識佛學，義天（1055-1101）入宋在晉水淨源（1011-1088）下學習華嚴佛學，其漢語能力操縱自如。元朝之時，不少高麗儒者入元朝為官在元朝為官的韓儒，在其著作中也留下筆談的記錄，這些學者不論是在韓國或是在元朝，皆可操用漢語，但其竟然也使用筆談的溝通方式，顯然是藉由筆談而守密之意。

日本雖然傳說自百濟王仁傳入儒學及漢字，但真正的大量引進及學習卻是在唐朝之時，在語言政策方面直接設置官署教授華言，採取課試進度要求學生，同時要求僧侶需以華語頌讀佛經，亦即不論是貴族或僧侶以能直接讀頌漢文著作為主。奈良及平安朝不乏漢文學養優秀的貴族文人，其作品程度之高不在華人之下，兼之入唐的僧侶通曉華語者甚多，甚

¹⁷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吉本道雅：《韓半島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下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契丹小字銅鏡》描述了遼金時期的文字系統，全然是借用漢字偏旁造新字，而用自己的讀法讀之，頁 113-144。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譯語から永寧寺記碑へ》（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9）第三章〈永寧寺記碑〉清楚地記錄了明代時期的女真文字表達方式。頁 139-220。西田龍雄：《西夏文字》（東京：玉川大學出版部，1980）〈西夏文字の構造〉，頁 121-160。

¹⁸ 中村春作等（編）：《統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頁 1-14。序中討論了韓、日、琉球等以各自訓讀的方法來學習漢文，漢文也成為漢字文化圈形成的主因。

¹⁹ 參考湯澤質幸：《近世儒学韻学と唐音-訓読の中の唐音直読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4）

²⁰ 傳說新羅時代的薛聰發明以新羅語閱讀漢籍的方式，這稱之為吏讀，但近代認為吏讀應非一人所創造，薛聰應是整理者。

²¹ 〔高麗〕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叢書集成本。

至可與詩人唱和者。

鎌倉時代(1185-1333)之後，貴族勢力逐漸下降，通曉華語者漸成少數，但五山禪僧不乏通曉華語及華文創作者，其質量之高亦不在華人之下。室町時代(1338-1573)間有日僧到中國之後，大部分除了巡禮之外，也有不少人留在江南禪寺成為寺組織的一員，間有成為中國禪寺的主持者，雖然這是少數特例，但雪村友梅（1290-1347）曾擔任長安翠微寺的住持，明初之時，亦有日僧到四川為僧，最後葬於中國，這些僧侶的華語必然是精通。

德川政府之後，中日交流逐漸不便，要求以原文頌讀儒佛典亦漸成困難，提倡以日語讀頌儒佛原典的呼聲漸起，同時也漸成主流，²²識漢文卻無法以漢語讀頌者成為普遍現象。於日本而言，由直接頌讀漢學著作轉而以和語頌讀，以漢文筆談溝通實自德川之後才普遍化。

越南古稱交趾，自漢唐至北宋初仍是屬於中國的領域：《高僧傳》中已有記載交趾的僧傳記錄，自北宋之後，逐漸離開中國的政治統治，但在文化及宗教上仍與中國緊密相連，採用漢文典籍，接受佛教，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與中國的來往不斷離，便採用喃字越語的方式來記錄。²³喃字是一種字符系統，以雙漢字併成而以越南語音讀頌的方式。越南自宋以下脫離中國的統轄，但在文化上仍與中國結合，但當與中國來往時，在言語的溝通上仍然採用筆談為主。

三、諸國交流時對筆談的重視

透過貿易交流、禪佛教來往，華語作為東亞強勢語言自是溝通選擇的語言，先是透過文化及宗教的整合，繼之當貿易越來越熱絡之後，共通語言的交流，其重要性越形顯著。尤其在明朝之時，透過朝貢貿易整合東亞政治秩序，中國週邊國家在來往之時，筆談即是最好的選擇方案，即使不是與中國交流，而是各國因貿易往來時，以華文作為筆談仍是唯一的選擇。

如實而論，即便是中國雖然強勢語言，但隨著時代遞嬗更迭而有南北的遷移，境內也是各地方言不一，環繞著中國的諸民族實不可能全部照學，語言交流所造成的不方便，便由同文書寫來達成溝通的目的。隨著越趨近代，東亞諸國交流越加頻繁，漢文便成為書同

²² 荻生徂來即持訓讀無用論，主張要用日語來讀漢文學，廢除以唐音來讀漢文學，興起了日本國學研究。參考〈荻生徂來の訓讀否定論〉237-246。收於中村春作（編）：《訓讀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4）

²³ 字喃的設計，大略來說或借用同音漢字而變其意義，或轉變漢字音訓以越南的聲義，或採組合漢字創新字法，參考竹內與之助：《字喃字典》（東京：大學書林，1988）解說。

文的唯一選擇，與其透過翻譯者來雙向溝通，有可能被漏掉翻譯的內容，或是語意的猜測，倒不如透過漢文書寫，語意明確不易被漏掉，因此，筆談亦隨著東亞之間的貿易、交流轉而盛行。

以漢文書寫筆談主要作用在不同民族間的溝通上，目前所見的研究則集中在底下幾個方面：

（一）外交聘宴

對於筆談此一主題，目前研究的重點集中在韓日的文化交流與中韓的交流，但以外交聘宴的詩歌唱和而言，則以韓日的相會時所留下的資料最多。韓日的外交交流稱之為通信使、報聘使，名稱不一，但後來以通信使稱之，這其實也是朝貢體制的一環。

韓國朝鮮時代與日本的通信使交流自室町時代開始直至德川政府時代，但交流頻繁則在德川時代，二百多年之間約有十二次的交流，其目的不外是祝賀新將軍上任、戰後締結和約，同時藉此機會觀察日本國情變化。²⁴

朝日的外交聘宴中，例以漢文筆談，同時有詩文唱和之舉，當然也是各以漢文作詩唱和。例如林羅山（1583-1667）〈韓客筆語〉、〈與朝鮮朴安期筆語〉、²⁵新井白石（1657-1725）《坐間筆語·江關筆談》，其中《江關筆語》是朝鮮通信使趙泰億（1675-1728）與新井白石的筆談。²⁶又村上秀範輯《和漢唱和錄》，此書原名為《朝鮮筆談和漢唱和附錄》，觀其書名，詩文唱和例以筆談為之。²⁷朝鮮與日本之間的朝聘時，運用筆談達到外交交流的作用，其目的不僅在於外交交流，同時還有文化競賽、觀察對方國情趨勢的目的。由於漢詩文的學習到能自由地表達，本身就需較深的文化素養，而當時朝鮮與日本心中存有彼此較勁的心態，因此，以詩文筆談來唱和，可以表達自身文學修養與觀察對方文學素養的目的。

另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韓日之間透過通信使之便，筆談唱和本為席間常事，但少見結

²⁴ 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の足跡》（東京：明石書店，2011）〈第一部-室町時代と壬辰倭乱期の日朝交流〉，頁 11-92。鄭章植：《使行録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観：江戸時代の日朝関係》（東京：明石書店，2006）第一章〈一六〇七年の回答兼刷還使による刷還と敵情探索〉，頁 16-59。

²⁵ 〈韓客筆語〉收於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東京：べりかん社，1979）卷 60〈雜著五〉，此中收了林羅山與朝鮮松雲禪師、權伏、文弘績等人之筆語，〈與朝鮮朴安期筆語〉也收於此卷。

²⁶ 筆談云「辛卯（正徳元年）十一月五日，在江戸，時白石源興君美（新井筑後守）來訪館所，敘寒喧訖，平泉取紙筆，書示曰：筆端自有舌，可以通解，何必借譯……」，此輯本為古文書，藏於大稻田圖書館。

²⁷ 鄭英實：〈朝鮮後期知識人と新井白石像の形成-使行録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11）。又《和漢唱和附録》由浪華澁川與市於 1748 年出版，浪華即大阪，朝日外交使節的唱和詩常在浪華舉行。目前以和古書的形式收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為知交者，這原因乃是兩國之間有著微妙的敵對關係，兼之數年一會，本無固定的通信使官員，如何結為知交？更何況以當時的文化程度而言，恐怕在朝鮮學者心中未必與日本學者為友。²⁸

外交聘宴詩文唱和之事也常見於中朝之間，自元朝成為中國統治者起，也控制了高麗，高麗儒官例往瀋陽述職報聘。明清之時則是往北京朝貢報聘，這旅程則稱之為燕行錄或燕行記，或稱之為朝天記，即朝見天子的旅程之意。

元朝既以蒙文或北京方言為溝通，但對高麗儒官而言，這些語言未必精通，即便是通曉北京官話，以漢文書寫筆談自為必要之事，有時是為了防元朝人的刺探消息而用漢文筆談，有時是高麗人之間在對話時也用筆談，這都是為了防範不測消息外漏，在此中的高麗儒官也記錄了不少元朝的秘密。²⁹

明清之時，朝鮮往北京報聘是為朝天述事，地位不等，藉用筆談在朝廷上詩文唱和之舉，純然是表達自身漢文漢素養，藉以達到與明清官友達到友善交流的目。但朝鮮學者卻可藉此機會遊覽北京之地，藉此機會認識學者，中朝學者交流自是以筆談為主。

中朝之間的筆談議題，目前研究者大多集中在洪大容（1731-1783）及朴趾源（1737-1805）因旅行後所帶動的學術風氣的變化。³⁰但除了洪大容及朴趾源之外，也有不少到中國的朝鮮儒學者藉燕行之便，與中國學者結交者，甚或道路相逢便以筆談論交者也不在少數，這些資料具見於朝鮮學者的文集中。³¹例如李海應的〈薊山記程〉、南公轍（1760-1840）〈燕京筆談〉等皆描述了他們往中國的旅行中筆談交友之事。³²其他的筆談

²⁸ 高橋博巳：〈朝鮮通信使〉，《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兼葭堂》（東京：新典社，2004），頁 7-72。

²⁹ 如元文宗弑殺明宗以登帝位之事，元朝官方記錄不清楚，而此時在元朝為官的高麗李穡則詳細記錄此事，並言明當時的討論是以筆談為之。〔高麗〕李穡(1328-1396)《牧隱集》卷 15〈海平君謚忠簡尹公墓誌銘并序〉云「文宗自江南先入宮正位，迎明宗于朔方，文宗出勞于野，丞相燕帖木兒進毒酒，明宗中夜崩，六軍亂。」由於李穡曾在元朝為官，回高麗後方事撰述，本無中國的政治壓力，所述較為得實。文收於杜宏剛等（編）：《韓國文集集中的蒙元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523。

³⁰ 金泰俊：〈洪大容の中國觀と北京の印象〉，《虚学から實学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頁 19-32。高橋博巳：《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兼葭堂》（東京：新典社，2004）第二章討論了朝鮮北學派洪大容到日本之後，發現日本學朱學之盛不在朝鮮之下，日本也重視陽明學，則超乎洪大容的意料之外，頁 84-88。對於洪大容出使後的東亞觀的改變，另見夫馬進：〈1765 年洪大容の中國京師行與 1764 年朝鮮通信史〉，《復旦學報》第 4 期（2008），頁 18-32。山内弘一：〈朴趾源における北学と小中華〉，《上智史學》37（1992），頁 163-190。

³¹ 夫馬進：《朝鮮燕行と使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第二部討論了 16 及 17 世紀之時，朝鮮燕行使對於中國的觀察。夫馬進：《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第七〈朝貢關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討論了朝鮮藉朝貢之便收集中國的情報。

³² 例如〔朝鮮〕李海應《薊山紀程》記錄了他派使到中國的旅行日記，每一卷皆記錄了到處與人以筆談詩文唱和及結為詩友的經過，這過程是頗為隨意而暢快。這樣的經歷在當時被派往中國朝貢的學者或官員是相當常見之事。有關於李海應的旅遊日記，參考劉順利：《朝鮮文人李海應〈薊山紀程〉細讀》（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朝鮮〕南公轍：〈穎翁再續藁卷之二〉，《金陵集》（漢城：景仁文化社，

資料則散見於各式的《朝天記》及《燕行記》中，有待進一步地分析整理。

其他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尚有琉球、安南（今之越南）、南掌（今寮國前身）等國家，這些國家的文人大都接受漢詩文訓練，在奉使朝貢時，在中國通常也是行使筆談者為多。舉例而言，安南後黎朝黎貴惇於 1760 年奉使北上，而清乾隆廿五年至廿七年（1760-1762）之時，朝鮮、琉球與南掌（今寮國前身）諸國也因朝貢之故，在北京相遇，在此因緣際會之下，五國之間的學者彼此以筆談交流，並留下難得的詩文唱和記錄，這樣的筆談會晤實為一時盛事。³³然而這一方面的研究實為不多，此其因當為越南以漢文寫作而留下的資料相對偏少，尤其越南的漢文創作中夾雜不少獨創的喃字，這對外界的解讀實造成困擾，尤其近代越南本國的學者也未必了解漢文及喃字。域外所保留的漢籍中，越南這一區域實可再深入研究。³⁴

（二）旅遊中所進行的交流活動

日本自唐代派遣唐使到唐朝學習開始，雖有通華語交流者，但更多的是以筆談來雙向溝通，以達到交流的目的。而自宋代的日僧入宋始，幾乎是以筆談來完成入宋巡禮的歷程。

入宋僧以裔然（938-1016）為始，〔宋〕楊億《楊文公談苑》云：

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來朝，獻其國職員令、年代記，裔然依錄自云藤原氏，為真連，國五品官也。裔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³⁵

所謂的「善筆札而不通華言」即是無法以語言來溝通，但其漢文素養程度不差，因此借助筆談。裔然之後的入宋僧皆是以筆談與宋人溝通，如另一奉使到宋朝的僧寂照，寂照在華的行蹤，〔宋〕楊億（974-1020）《楊文公談苑》一書有比較詳細的記錄云：

2001），頁 595a。

³³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2），頁 109-153。相關文獻見後黎朝黎貴惇：《桂堂詩彙選》（上海：復旦大學，2010），頁 67。收於中國·復旦大學、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 3 冊。另朝鮮·李商鳳：《北轅錄》也記錄了朝鮮使節與黎貴惇相會的記錄。資料見《北轅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部，2011），卷 4，頁 19。收於中國·上海復旦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17 冊。

³⁴ 參考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有關於北使文人的文學著作狀況，見其書第五章〈越南北使文獻與詩賦外交〉，頁 293-367。

³⁵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 13 條「日本僧裔然朝衡」，頁 8。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還，合門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³⁶

「不通華言，善書札」可見也是透過筆談來溝通意見了。

在宋元之時，不少日僧到中國旅遊及巡禮，大底都是以筆談的方式來溝通，以完成巡禮的目的，間有留下在中國寺院中擔任寺職者，停留時間久，自可以華語溝通。這批入宋入元僧為數甚多，略通華語，但口語溝通則不夠流暢，自然需以筆談來完成旅行，諸如道元（1200-1253）、雪村友梅（1290-1347）及龍山德見（1284-1358）等，這些日僧在日本大致學過漢詩文，但在宋元遊歷時，口言的溝通實未必流暢，因此，還是以筆談來交談。這些都不是孤例。

近代中日戰爭之前，二國人士在爭亂中也互相來往，中國公使到了東京之後，由於不通日語，而日本方面，由於自德川時代（1603-1867年）以來，以漢文誦讀的風氣已漸趨弱，轉治蘭學者增多。明治維新之後，摒棄漢文學訓練，因此在此期來往者，除了傳統的漢學者外，大抵不能操漢語者居多，因此，雙方使用筆談也是當然之事。此中最有名者即清朝公使黃遵憲（1848-1905）及何如璋等人與東京桂林莊主人大河內輝聲（1848-1882）的交往，透過筆談的方式，黃遵憲一行人與大河內輝聲暢談時事，這些交談過程即被筆錄下來，成為一段佳話。³⁷從中可看出，清末的朝廷公使出使日本之時，即便雙方語言不通，但仍可藉助於筆談的技巧來溝通彼此的看法。

（三）異域的漂流

海上航行難免海難而漂流至異域，這有三種狀況，一為海上貿易遇難漂流，二為海上捕魚遇難漂流，三為因戰爭遇海難而漂流。當時的常態是經過審訊確認無誤之後，由當地政府找個時機遣送回國，而審訊過程往往也是通過以漢字筆談溝通。

東亞的貿易交流自宋朝以下即已興盛，航海線路分北線與南線，北線方面從韓國、日

³⁶ 同前註，第14條〈寂照〉，頁10-12。

³⁷ 參考實藤惠秀（編）：《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流》（東京：平凡社，2003）。張偉雄：《文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東京：柏書房，1999），所討論的則是當時中日韓之間的外交及政治問題，此中大量使用筆談的方法。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23，從筆談的詩文來觀察，黃遵憲並不看重此次的會談，但大河內輝聲則是留下不少的會面筆談的資料，可供後人參考。王寶平（編）《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1-8冊則將這份筆談文書資料照相存檔，足可參可。大河內輝聲的筆談記錄依據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對象的談話分為八個部分：〈羅源帖〉、〈丁丑筆話〉、〈戊寅筆話〉、〈己卯筆話〉、〈庚辰筆話〉、〈泰園筆話〉、〈韓人筆話〉及〈書畫筆話〉等，與黃遵憲的會談見於〈戊寅筆話〉這部分。

本到中國的江浙，南線則從江浙到南洋。³⁸來往既密切，海上航行則有其風險，漂流自可能發生。

另一種情形則是東亞的漁民或商船在海上遭海難後漂流至異國的故事，或是朝鮮漁民漂流至中國或日本的狀況，或是日本漁民漂流中國福建之地，異地人必經當地政府審訊後決定放行與否，在溝通過中必需用筆談的方式，此中就需要中間的譯者或舌人雙向溝通，再筆談將之記錄下來。³⁹

其次，因戰爭而漂流的例子，最著名者即是十六世紀末的韓國壬辰倭亂時，朝鮮文人在戰中遇海難，漂流至明朝獲得解救，通過筆談與明朝官員溝通戰時情報，或與明朝官員進行詩文唱和，因為優秀的漢詩文涵養，這些朝鮮文人在明朝受到一定程度的禮遇。⁴⁰或漂流至日本成為俘虜者則在日本受到審訊，審訊過程中是以筆談方式進行，其中最有名者為姜沆（1567-1618）與藤原惺窩（1561-1619）的戰亂情誼，藤原惺窩透過筆談審訊姜沆，從中了解朝鮮朱子學的發展過程，進而促使朝鮮朱子學傳入日本，而藤原惺窩成為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之祖。⁴¹

另有一位朝鮮儒者魯認（1566-1622）也在壬辰倭亂中被俘至日本，但趁機逃離後，隨商船至福建福州一地，再輾轉至北京，所行過程中，常以筆談論述當時的戰況以及表達對中華的仰慕之情，在北京時，也與當時文人進行筆談唱和詩歌，在戰事平定之後，由明朝政府送回朝鮮。魯認將這段戰時經歷撰成《錦溪日記》一文，⁴²戰亂之際，像魯認這樣的經歷者實不少見。

四、結語

在筆談的研究方面，尚有幾個方向待開展者，一為宋元之時中日之間的佛教交流，從最早的裔然（938-1016）與成尋（1011-1081）入宋開始，裔然回日本傳達宋朝佛教的訊息，成尋則願意死於開封，以完成他的夢想，他們二們入宋巡禮全靠筆談溝通。南宋中葉

³⁸ 榎本涉：〈序章〉，《僧侶と海たちのシナ東海》（東京：講談社，2010），頁5-27。

³⁹ 參考松浦章：〈日本人の中國漂著の另一面〉，《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閣閣，2007），第5編，頁301-344。松浦章：〈中國漂著朝鮮船と朝鮮漂著中國船-海路による交渉〉，《近世中國朝鮮交渉史の研究》（京都：思閣閣，2013），第3部，頁155-244。

⁴⁰ 參考松浦章（編）：〈朝鮮船漂到中國問題〉，《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漂著船》，（臺北：樂學書局，2002），第2部，頁77-96。

⁴¹ 藤原惺窩：〈姜沆筆談〉及〈朝鮮役捕虜との筆談〉，《藤原惺窩集》（東京：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9），卷下，頁369-376。

⁴² 見〔朝鮮〕魯認：《錦溪先生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卷2諸節。此書收於《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281冊。

後入宋日僧逐漸增多，大部分也是靠筆談溝通。有資料可考證的宋元禪僧到京都及鎌倉弘法者不少，不少僧侶被聘請為日本寺院的住持，這些中國禪僧集中在江南到福建之地，鄉音方言差距不小，這些僧侶在日本弘法時，必然是以自己的方言為主，在當時中日禪僧所留下的語錄中全以熟練的漢文為表達主體，因此平常的溝通交流時藉助筆談也可想像知。

另明初之時，有日僧或貴族隨著遣明船到中國，有些人被明太祖敕送往四川禪寺為住持，這些僧侶在當地名聲顯著，然平常之時也是需靠筆談溝通。但這些在不同時期入宋或入明的日僧，筆談交流資料留下者不同，實可再探討此方面的現象。

此外，近代的日本佛教學僧到中國時，或尋求宗教的結盟，或為政府探察中國地形，或求傳教的機會，筆談也是溝通要法之一。如真宗宣教者小栗棲香頂（1829-1905）到北京觀察及謀合中國佛教僧團共同對抗西洋宗教以及到中國傳教的可能性⁴³、鈴木大拙（1870-1966）到中國之後與魯迅等結友對談、⁴⁵常盤大定（1870-1945）踏查中國佛教名寺古剎等記錄等。⁴⁶這方面的研究尚可再拓展。

近代錯綜複雜的政經關係，不管是為那種原因，宗教、軍事及文人之間的來往，以北平方言為標準音音尚未大力普及，而在密切交流之下，所要面對的語音溝通將是更為困難，筆談必是重要的之法，然而在這方面的研究仍待開展。

例如，近代政局的紛亂，臺灣也站上世界舞台，臺灣的知識分子到大陸，或者清末民初的學者到臺灣者逐漸增多，臺灣的知識份子通行閩南話，通曉北京話者不多，但卻通曉漢文，以此為媒介，雙方進行筆談者並不少見，但目前所留下的資料卻不多，這也是待開展的地方。⁴⁷

而越南自宋朝以後，在政治上逐漸脫離中國的控制，但在文化上仍然緊密地與中國連接，舉凡科舉考式、宗教及文化等仍與中國相接，學習漢文也是越南知識分子常見之事。

⁴³ 此中如竹添光鴻（1842-1917）的《棧雲峽兩日記》記錄了川蜀之行，實為觀察中國民情及蒐集情報之旅，收於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59輯。河口海慧（1866-1945）撰《西藏旅行記》（東京：博文館，1904）雖是研究西藏佛教的冒險之旅，其中也參雜了探察西藏民情。

⁴⁴ 小栗栖香頂為達此二目的，特地到北京後學中國語言，但平常皆靠筆談之法，見其所著《北京護法論》、《北京紀事·北京紀游》二書。參考陳繼東整理：《北京紀事·北京紀游》（北京：中華書局，2008）。

⁴⁵ 鈴木大拙（1870-1966）從1934年5月開始一趟中國佛教之旅，從江南一路北上至朝鮮，撰成《中國佛教印像記》一文，途中與文人及僧侶交談，必請翻譯或以筆談為之。書載於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卷30。

⁴⁶ 常盤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東京：龍吟社，1942），在其旅行中踏查了大部分的佛教史跡，這些都是中國人平常不太注意的地方，常盤大定對於中國佛教的研究的確有其功績，但踏查的目的含有政治企圖。

⁴⁷ 章太炎、巴金、錢鍾書及郁達夫等皆曾到臺灣，但未留下太多的交談資料，而此中最突出者如梁啟超與林獻堂在日本多處會面，同屬中國人的二位知識份子，幸而可以筆談的方式溝通，討論中國未來的方向。見陳小沖（編）：《台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臺北：崧燁文化，2018），頁185。謝金蓉：《青山有史：台灣史人物新論》（臺北：秀威資訊，2006），頁67。

自明朝以後，越南也加入以明朝為主的朝貢體制的貿易圈，東亞各國皆有貿易來往的關係，越南的學者或官員熟悉漢文寫作者並不少見，但未必能精通漢語的表達，筆談也是與外界溝通的方式。這部分也是有待開發研究的議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劉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梁〕慧皎：《高僧傳》，T50，No. 2059。引用自：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sutra/>（《大正藏》以 T 稱之，No.=經號。）
 （2020.07.08）
-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明〕顧炎武：《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高麗〕李穡：《牧隱集》，收於杜宏剛（編）：《韓國文集集中的蒙元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高麗〕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叢書集成本。
- 〔朝鮮〕南公轍：《金陵集》，首爾：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鮮〕魯認：《錦溪先生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年。
- 〔後黎朝〕黎貴惇：《桂堂詩彙選》，收於中國·復旦大學、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2010年。

二、近人論著

- Matteo.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ru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New York：
 Random House，1953。
- 王寶平（編）：《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
 《臺大歷史學報》，2012年。
- 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
- 陳小沖（編）：《台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臺北：崧燁文化，2018年。
-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譯語から永寧寺記碑へ》，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9年。
-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著，吉本道雅譯：《韓半島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京都大學

學術出版會，2011年。

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劉順利：《朝鮮文人李海應《薊山紀程》細讀》，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

劉順利：《朝鮮文人李海應《薊山紀程》細讀》，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

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

謝金蓉：《青山有史：台灣史人物新論》，臺北：秀威資訊，2006年。

〔日〕山内弘一：〈朴趾源における北学と小中華〉，上智史學，1992年。

〔日〕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

〔日〕中村春作（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

—————：〈琉球における漢文読み-思想史的読解の試み〉，中村春作（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

〔日〕夫馬進：〈1765年洪大容的中國京師行與1764年朝鮮通信史〉，《復旦學報》，2008年。

—————：《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

—————：《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年。

〔日〕石井公成（編）：《漢字文化圏への広がり》，東京：佼成出版社，2010年。

〔日〕石塚崔高：《琉館筆談》，筑波大學藏本。

〔日〕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の足跡》，東京：明石書店，2011年。

〔日〕竹内與之助：《字喃字典》，東京：大學書林，1988年。

—————：《字喃字典》，東京：大學書林，1988年。

〔日〕竹添光鴻：《棧雲峽雨日記》，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日〕西田龍雄：《西夏文字》，東京：玉川大學出版部，1980年。

〔日〕西嶋定生：《倭国の出現-東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

〔日〕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圏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00年。

〔日〕村田雄二郎：〈漢字圏の語言〉，村田雄二郎（編）：《漢字圏の近代-ことば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東京：べりかん社，1979年。

〔日〕岩月純一：〈漢字と漢字系文字〉，《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9年。

- 〔日〕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閣閣，2007年。
———：《近世中国朝鮮交渉史の研究》，京都：思閣閣，2013年。
- 〔日〕河口海慧：《西藏旅行記》，東京：博文館，1904年。
- 〔日〕金泰俊：《虚学から實学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
- 〔日〕宮本徹：〈アジアの語言と漢字-漢字の受容によるアジア諸言語の変容〉，《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9年。
- 〔日〕高橋博巳：《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蕪葎堂》，東京：新典社，2004年。
- 〔日〕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跡踏査記》，東京：龍吟社，1942年。
- 〔日〕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東京：柏書房，1999年。
- 〔日〕湯澤質幸：《近世儒学韻学と唐音-訓読の中の唐音直読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4年。
- 〔日〕湯澤質幸：《唐音の研究》，東京：勉誠出版社，1987年。
- 〔日〕新井白石：《坐間筆語・江關筆談》，此輯本為古文書，藏於大稻田圖書館。
- 〔日〕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 〔日〕實藤惠秀編：《大河内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東京：平凡社，2003年。
- 〔日〕榎本涉：《僧侶と海たちのシナ東海》，東京：講談社，2010年。
- 〔日〕鄭英實：〈朝鮮後期知識人と新井白石像の形成-使行録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11年。
- 〔日〕鄭章植：《使行録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觀：江戸時代の日朝關係》，東京：明石書店，2006年。
- 〔日〕藤原惺窩：《藤原惺窩集》，東京：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9年。

Pen Talk : East Asian Cultural Exchange under the Same Words

Lan Jih-cha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in modern times means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a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all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spread from China to Japan, South Korea, Vietnam, and Vietnam,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he medium of cultural exchange is naturally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Although the East Asia exchange started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here was no concept of official speech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main stream of pronunciation was mainly from the time when the exchange was made, and the mainstream pronunciation changed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Six Dynasties, Wu Yin was the mainstream in the South. In the Tang Dynasty, Heluo and Northwestern were the mainstrea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u Hang sound was the mainstream.

Although the written words are the same, but the tones are different, this is also a nuisance to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the tone changes, the writing remains the same. The pen talk is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n communication.

Ming Taizu established the tributary syste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North Korea as the ties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Japan, the Yan Dynasty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DPRK to exercis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PRK and Japan, when the exchanges are general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pen. Even when Vietnam communicates with Ryukyu and Japan, it communicates through pen talks.

The things in pen talk are rar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frequency of writing records in Ming Ming's writings has increased. 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conversations in writing has confirmed the status of exchanges in East Asia and the gr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HungKuang University, Taichung

scene of cultural exchanges. Although the matter is simple, its significance is very significant.

Keyword:Pen Talk,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ast Asian Cultural Exchange , Tributary system , Travel Accounts to Beijing